

DIQIU DA CUN LUO

地球大村落

熊 飞 樊海林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地球大村落

熊 飞 樊海林 著



东方出版中心

第一章 冷战的终结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

1991年圣诞之夜,神情黯然的戈尔巴乔夫向全苏联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总统等一切职务,苏联宣告解体。

飘扬于克里姆林宫上空74年之久的镰刀斧头旗徐徐落下,一个大国衰落了,一个曾令世界任何角落谈虎色变的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不复存在,华约随即解散,冷战终结。

一度被“自由世界”媒体追捧为超级政治明星,倡导改革“新思维”,誓为苏联建立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位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在一片是非曲直的哗然声中离开冬宫,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了句号,却为消除压迫、追求自身解放的世界人民留下一长串的问号。

西方世界无不踌躇满志,美国总统布什当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在苏联大获成功,美国将竭力把解体后的苏联纳入“西方自由世界体系”,冷战以西方“自由”、“民主”、“市场理念”的“胜利”而告终结。

历史已经走向终结? 历史的车轮又将驶向何方?

没有硝烟的战争

冷战源起

15世纪,伟大的探险家哥伦布的船队远航美洲大陆,会合东西半球之际,人类全球化的进程自此发端。资本主义几个世纪的自我膨胀和对外扩张同时加速着人类全球化进程的步伐。

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和殖民体系矛盾激化,更是全球一体化的集中体现。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了全球80%的人口和几十个国家,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族交往,特别是共产主义的苏联的加入,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空前密切起来,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趋势日益增强。

二战以纳粹德国的失败而告终,美、苏、英、中四国首脑聚会雅尔塔,构筑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美国人又一次有机会提出他们对世界秩序的总体规划。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像当年伍德罗·威尔逊一样,不失时机地提出通向和平的、和谐的世界秩序的设想。所不同的是,威尔逊的出发点是“民族自决”,它所表达的政治信息是美国孤立主义——拒绝利益冲突的概念。这一点在《十四点意见》中表现得很清楚。而罗斯福的出发点是寻求建立一个由美、苏、英、中四个“警察”维持的世界秩序。但是,斯大林主义使罗斯福的理想一下子落空了。一时间,美国拿不出一个“基本概念”来处理战后异常复杂的国际事务。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一位年轻外交官乔治·凯南给美国政府发来一份“长篇电报”,从哲学上诠释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在凯南看来,苏联的对外政策深深地扎根于苏联的社会制度之中。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观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敌对国家。这一点是难以挽回的。苏联与美国的矛盾不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某种误会的结果,而是

苏联世界观中固有的产物。因此,美国和苏联的目标和哲学是不可调和的。美国除了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之外,别无选择。那就是动用美国的一切资源在全世界与苏联对着干,遏制共产主义,令其自然衰败,从而“拯救”苏联社会。这种遏制主义政策统治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1947年7月《外交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进一步确定了放弃谈判、采取遏制的基本概念。美国的资源和力量被调动了起来,富有“政治美感”的外交哲学则被丢弃了。美国从此走上了以资源分工协作思考的时代。“遏制”政策追求的目标是要破坏苏联社会。

与此同时,苏联作为唯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巨人继续壮大,以苏联为代表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势力空前强盛。

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毁灭,美苏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导矛盾。美国和西方有相当多的右翼势力一直在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同样,由列宁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在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中没有从始至终贯彻下去,而是将和平共处思想曲解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美苏力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扩展开去,斯大林毫不讳言:“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战后美国的世界战略不可避免与苏联“安全带”战略在东欧地区迎面相撞,雅尔塔体制确立的和平共处很快蜕变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共处。美国学者帕特森认为:“冷战根源在于战后不同的需要、意识形态、风格,这两个竞争者的力量以及继承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信任。”

在冷战背景下,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具有明显的军事政治特点,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的世界经济由军事分界线变为政治分界线划定,欧洲和德国出现东西之分。军事上,华约和北约对峙,还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此外,在世界性经济组织中,苏、中等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不参加关贸总协定。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设立巴黎统筹会,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技术禁运清单。从此,各国经济、尤其是两大阵营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服从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

一道“铁幕”在东、西世界之间垂下,一场没有硝烟的“冷战”爆发。

冷战——一体化的反动

两极冷战体制虽对战后维持几十年的世界和平起了一定作用,但在冷战体制之下,始终存在美苏激烈的军事对抗,这种军事对抗同频频发生的国际危机相联系,同大量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相联系。五六十年代美苏激烈争夺不仅导致了多起国际危机(如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甚至发生了朝鲜和越南等局部战争。冷战使战后世界虽有和平,但无安宁。此外美苏两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严重失调、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苏联表现特别严重)。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军备竞赛,这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冷战严重迟滞了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在冷战背景下,各国经贸关系往往局限于某一特定市场。50年代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每年增多,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78.37%,同西方贸易、信贷关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东西欧国家之间,中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大大削弱。1938年东欧国家对西欧国家出口占总出口额的68.4%,1953年仅有14.4%输往西欧。世界市场的割裂加深了5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对外的疲软,1951年和1954年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从722亿美元增加到760亿美元;进口总额分别为803亿美元和784亿美元。冷战抑制了国际分工、国际资本、技术、劳务在更广泛全球范围内迅速国际化的进程。两大阵营对峙使美国力图在战后建立一种囊括全球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梦

想化为泡影,在西方虽然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和经济秩序,但首先是由于冷战等因素的影响,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在战后头 10 年运转并不有效,大约直到 1958 年,在战后国际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单独的直接领导。由于整体上苏联东欧集团经济落后,多数国家战前经济联系薄弱且缺乏互补性,到 50 年代中期经互会的封闭性虽曾促进成员国经济(尤其是 50 年代)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阻碍成员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冷战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恶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外部环境,硬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模式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政治上的分裂和冷战反过来延缓了世界政治民主化进程,妨碍了文化交流和正常的往来。在冷战体制下,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和广大中间地带的斗争,这种争夺使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依附于两个超级大国,接受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妨碍了这些国家独立自主探索其发展道路。在两大集团内部,美苏颐指气使,形成了美苏与成员国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助长了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倾向。冷战体制还毒化了政治气氛:在联合国活动的最初 10 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操纵“表决机器”,试图把联合国变为冷战工具。由于冷战,无论在苏联东欧,还是在美国,都导致了一系列破坏民主与法制的行为:在苏联,早在冷战酝酿的 1946 年就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批判运动,并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医生谋杀案”等冤案;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在东欧也发生了一系列清洗运动,许多党政领导人被冠以“帝国主义间谍”、“铁托分子”等罪名遭到清洗、逮捕和镇压。美国 1950 ~ 1954 年则出现了一股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歇斯底里的反共反民主的浊流。冷战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成为 80 年代苏联东欧剧

变的重要原因。冷战在西方人们的心灵、文化等方面也带来了重大创伤。冷战意识和冷战思维钳制了思想,不利于科学探索和文化发展与交流。冷战还妨碍了正常的友好往来,1950年国际旅游人数只有2528.2万人。

全球一体化融蚀冷战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融蚀了冷战的根基。

5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资本和技术的国际化,西欧和日本从美国获取了巨额美元投资和大量先进技术。1955年美国对西欧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33.3%(150亿美元),1955~1975年日本共引进国外技术25777项,其中一半左右来自美国,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和日本传统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此外,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经济、政治协商组织,特别是欧共体等一体化集团的发展;垄断资本国际范围内宏观调节能力的加强等,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又不平衡的发展。在历史上,美国赶超英国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二战后到70年代初,短短20年左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由美国一个中心演变为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互相竞争的局面。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实力对比的变化逐步改变了战后美国和其盟国的关系。60年代开始,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西欧、日本政治独立性愈来愈强。

同时,美苏实力对比出现了不平衡发展。苏联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互助和合作,获得了某些东欧成员国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科技成果;并通过共同建设联合项目,加速了苏联东部地区资源的开发。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上升为经济中一个新的中心。1960~1975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3%、8.2%、4.0%。到70年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跃

居世界第二位。美苏争霸的态势也因美国的相对衰落由美攻苏守的局面转化为 60 年代末以后苏攻美守的局面,预示着国际格局更深刻的变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壮大。

帝国主义时期的世界殖民统治是以政治兼并、武力独占等为基础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它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战后经济一体化趋势格格不入。经过二战,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遭到严重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元气大伤,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美国凭借经济优势,加强向英法等殖民地渗透,企图实行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旧的殖民统治方式已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抛弃。

不仅如此,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际分工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传统的国际分工开始逐步被以工艺技术为基础的世界工业的国际分工所代替;发达国家主要贸易对象、战后国际直接投资的战略重点不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主体,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双向对流与日俱增。1950 年发达国家占世界贸易额的 $\frac{2}{3}$,1970 年上升为 $\frac{3}{4}$,1960 年美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占其投资的 60.6%,1970 年为 68.7%。

冷 战 终 结

大国兴衰

70 年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更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政治、经济多极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美国、苏联实力地位相对降低,日本、西欧等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一些新兴工业国和西欧经济迅速起飞,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力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化。西欧、日本及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国际事务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军事上,高技术常规武器迅速发展,从而造成了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之间军事实力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管理体制和经济模式与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日益不相适应,推动了到80年代汇合成强大世界性潮流的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苏联经济模式、管理体制愈来愈适应不了现代市场经济、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

6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1960~1970年下降为7%。伴随经济发展向效益型、质量型的转变,苏联奉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国防优先的国家战略以及以核武器为龙头的军事技术优先的发展模式与新技术革命的特征日益背离,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使苏联对这场高技术竞争麻木不仁,起步甚迟。苏联整体科技实力70年代中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80年代中期却落后美国10~15年,苏联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停滞更加明显。1970年以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公私合营高技术优势相继实行了从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而苏联由于缺乏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的高技术手段,企业大部分仍维持粗放的资源消耗型生产。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逐年下降,以至倒退,据美国估计:苏联国民生产总值1955年相当于美国的38%,1970年提高到50%,而1990年降至只有美国的25%。80年代苏联工业增长率年平均只有2.2%,低于日本(4.6%),落后于美国(2.6%)。1987年,苏联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被日本取代。苏联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直到1985年在苏联对西方出口的产品中,80%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等初级产

品,工艺水平高的产品只占与西方贸易额的 0.23%,在全世界机械制造业的总出口额中,苏联所占比重仅 2% 多一点。冷战最终使苏联陷入了解体的厄运。苏联的消失给两极格局划上的耐人寻味的句号,国际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多极化发展的新时期。

意识形态淡化

两极体制格局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以苏联为首组建的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国家集团与欧美国家的北约军事集团形成了两大阵营。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遏制政策”,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企图使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突出,特别尖锐。这种对抗很长时期以来深深地影响着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

随着两极格局的消失,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消失了,原来因政治对抗而被压抑的民族利益突出出来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此伏彼起。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虽仍然存在,但已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利益都要服务于增强国家民族利益。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世界形势趋于缓和。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加强了,理想主义在淡化。在各国经济关系加深,相互依赖加强的形势下,国际中的矛盾和斗争将主要反映在经济利益上,或更多的是反映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上。绝大部分的民族和国家都是或都将是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发展经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淡化是就整体而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今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都是要在相互协作、共同促进的情况下取得。意识形态的强化只能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才会突出出来。

欧美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强调民主、人权等,其目的在

于希望从内部搞和平演变。但它们更为重要的着眼点也在转向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上。同时它们也深深地明了要搞和平演变也只能先从经济着手,由经济带动政治,最后到意识形态的完全考虑趋同。美国与我国发展关系增多,更多地也是从经济贸易利益出发。其他西方国家也在淡化与我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矛盾,而将经济利益考虑放在首要位置。

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作用的淡化并不等于消失,有时会因某事、某种情况在某地区显现出来。如欧美国家对前南斯拉夫分裂和波黑冲突的态度,对越南、古巴、朝鲜等国关系的态度,等等,都说明意识形态斗争并未完全消失,有的时候还会激化。同时还应看到,欧美国家与待发展地区、国家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矛盾,也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发生冲突,甚至是很激烈的冲突。

政治地缘转向经济地缘

冷战时期,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国家集团是世界发展情势的主导力量,以这两极为轴心向全球辐射而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一种政治地缘关系。即使不结盟国家之间及其他联盟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政治地缘关系,只是活动余地较小。冷战后的今天,这种主导力量的原动力消失了。世界发展正朝着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竞争成为世界的主流,出现了经济地缘关系的世界。苏联解体后,经互会随即散伙,全世界既没有了“平行市场”,也没有了以政治为主要内涵的其他隔离式的经济市场,而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却大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国家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种互相依赖与互相发展、互相竞争的关系日益向深度和广度扩展。表现在某些大国之间却是一荣俱荣,一衰俱衰。解体后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除部分保持原有的经济关系外,也正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而且也必将要融入到全

球性的市场经济中去。今后的世界,将一反以往经济服从政治需要的现象,不是市场适应国家而是国家要善于适应市场。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早就形成的“传导性”与“同步性”——现在是频率更高,影响更深广。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世界跨国集团的兴起,世界贸易市场的伸展,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大,往往是无国界的。在此情况下,国际间的经济集团与联盟以及区域化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形成了当今以经济地缘关系为特征的经济集团组织。欧洲的欧共体即是突出的一例,其他还有美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南锥体共同体、亚洲的亚太经合组织,以及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东欧、中亚的独联体经济联盟、中亚和西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等,这一切构成了以经济地缘关系为主的世界。贸易区、自由市场或经济联盟正在成为经济一体化主要形式,参与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因素。目前,唯有欧共体一体化为最高阶段,其他则正在发展中,有的很难称之为联盟,而联盟也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与其他诸如民族、宗教、领土等纠纷相比,到 21 世纪更有可能爆发激烈的世界经济战与贸易战。

独立与平等呼声

国家独立与民族平等问题虽然在二战以后被视为普遍原则,但在两极体制后,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受这一体制的制约或影响,使这一原则未能得到完全的实现。当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占主导地位时,或以超级大国为核心组成国家集团时,国家间和民族矛盾冲突,包括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各种冲突和纠纷大都为两极对抗的需要而被压制或掩盖。冷战结束,两极格局不复存在,这些矛盾便突出来了。许多国家出现了分裂,国家的分裂带来了民族的分裂,民族的分裂又为新的国家冲突埋下了火种。许多民族在摆脱了集团的制约后,恢复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被解

放出来的民族感情又很快演变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并将矛头指向了邻国和本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这种民族界限和国家界限的混乱也是民族和国家纠纷的祸根。

在苏联除俄罗斯外的其他 14 个加盟共和国有人口 2 800 万,在俄罗斯境内,车臣人、奥塞梯人、印古什人等少数民族也纷纷提出独立的要求。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有纳—卡问题上的武装冲突;格鲁吉亚有中央政府与阿布哈兹地方政府的战乱;吉尔吉斯斯坦与阿富汗的冲突,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与罗马尼亚、乌克兰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有不同程度的激化。

华约集团解散后的东欧国家亦发生分裂。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其他东欧国家之间也有民族和边界的矛盾。

民族国家的分裂与斗争并不限于苏联影响的地区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即使那些具有较长独立历史的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诸如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也多少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冷战时期受美苏争霸的影响,因受到干预而发生内战或分裂的国家,却因冷战的结束而出现了民族和解,如南北也门的民族和解(现又分裂),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建立,南非的种族和解,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议和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内战的平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各国的民族独立与争取平等的要求。

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要求在冷战后又突现出来。一是由于同一民族居住了好几个国家内,其中有的是地理上相邻的国家,有的却是分散在几个并不相连的国家境内;二是由于同一民族却又有宗教或文化信仰的不同,它不仅有与本国其他民族相处的问题,又有与邻国、别国的同民族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的问题,这必然要牵涉到国家主权与民族平等的问题。民族矛盾牵动国家矛盾,加上宗教文化信仰上的撞击交织在一起,如泛阿拉伯主义、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基督教与东正教发展形成的各民族与国家间的差异,所有

这些都难以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得到抑制、平息,如苏联与东欧地区那样。除了客观现实上存在的不平等外,在某些情况下也因失去了能起平衡作用的力量所致。

核威慑幽灵

世界两极格局形成不久即开始了美苏核威慑的对峙——“恐怖的平衡”。冷战结束后,“相互毁灭”的核威慑很大程度上已消失了。因为俄罗斯虽有足够量的核武器也可远及美国,但两国关系已从对抗转而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当前欧洲的这种“和平伙伴”关系是否意味着核力量已失去了威慑性?是否仍需撑着美国的核保护伞?发展的现实证明,在欧洲美、俄、英、法四国的核力量仍在起着潜在的制衡作用,对整个欧洲形势的稳定仍有着正面效应。原苏联的某些国家和东欧国家急于谋求北约的安全保证,其中就有核威慑的因素。德国统一时承诺不搞核武器以及后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愿意放弃核武器,也就是因为有了美国和俄罗斯共同的安全保证。

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在我们想象之所及,没有进攻或防御的突破,核武器的威慑性是不会消灭的。事实上,只要一个国家(核)在受打击之后有能力进行报复,或者表现出有毅力要报复,它的核力量就很难为对方的先进技术所抵消。由于威慑占优势,第二次打击力量只需一个小小的力量,即小到足以维持第一次打击之后能不失报复能力,仅有几十枚甚至几枚核弹头即可。另一方面,由于核威慑战争可以不需要更大的常规力量,它只需要一支像“绊马索”那样的常规力量则可。因而核武器对国家是有利的,它可使这些国家集中资源和力量发展经济。当然,核武器也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危险,特别是小国、环境不利或不稳定的国家。但小国却可因此“威慑”大国。

一个国家的核战略只能威胁着或保卫着一个核国家的重大利

益。如在过去 50 年间,欧洲保持了和平,可是战争或武装冲突却常在周边地区爆发,所以说核武器只能保持具有核武器国家的重大利益,并维持了重要的国际秩序。

核国家在相互的军事冲突中,既不能期冀获得太多,也不会失去太多的利益。要获得重大利益就要冒核报复的危险。从逻辑上讲,威慑一旦失效,履行自身要冒毁灭危险的行动是不合理的,因而核威慑也就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效应。

正由于核威慑效应的存在,而科技的进步与普及又使不少国家具有发展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破坏武器的技术和能力,核扩散也成了国际安全的危险因素。

核扩散是否对国际安全有利?能否防止核扩散?怎样最为有利?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当然最好,但这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核武器既然已为人们掌握,就只能顺其发展规律逐步由控制到削减,由减少到全部转向为人类幸福服务。但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由于核武器毁灭性大,一般又不易保证它本身的安全,其要求的安全技术、保障制度当然很高。核武器的普及对国际安全不利,也不对任何国家有利,维护国家安全除自身力量外还得靠国际秩序与国际社会的共同保障。所以唯有在承认现实的情况下,承认现有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核力量的存在,同时谋求更严格制度的安全保证,逐步由控制到削减最低限量,最后使核能全部转为为人类幸福服务。

和平与发展

冷战结束后,新独立的国家或脱离了军事集团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问題。过去美苏对抗,互相戒备,安全有超级大国“可靠”。现在,华约解散、苏联解体,美国与西欧诸国是否就安全了呢?现实的发展却令欧美国家不是更放心,而是更加焦虑不安。

新的冲突、新的危机的爆发在欧洲大陆：民族主义激发民族战争；国际难民大潮流；原教旨主义的跨国活动；边界冲突、宗教矛盾；核扩散与核污染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威胁着国际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安全。同时国家安全又非一个国家，即使是大国所能解决的，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心、共同防范才能求得。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散，反而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与战略调整，并计划逐步扩大。而原来的一些苏联国家和华约组织国家也因形势的不稳定，并不满足于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而是更急于要求正式参加北约组织求得安全保证。与此同时，国家和民族的安全问题把联合国推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维和部队似已成了“世界救火队”。联合国是对国际安全负有责任的国家联合机构，当然对各国的安全包括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但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由于大国的操纵，强权政治盛行，一个国家的外部安全从来不可能获得可靠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国家的安全又不能完全脱离国际环境，二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除国家安全外，国家的发展更是个关键问题。一个国家的安全是与发展紧密联系的。发展是基础，它为安全创造条件，基础不巩固，安全就可能毁于一旦。发展是居于第一位的。发展是指综合国力的发展，单向或任何单一的畸形发展，如仅仅发展军事力量，或可求得一时或短暂的安全与巩固，但最终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安全也是求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任何意义上讲，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同时注意安全。

社会在进步，地球在缩小，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发展，都使人类社会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内外关系的变化与相互影响使国家安全与发展都脱离不开国际环境。要推进国际安全的保障体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世界性组织，应同时促进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